

# 凭窗读史

他到暑期木刻讲习班任教。他与松藻结婚这天，正好讲习班结束。遂由内山在“新半斋”订了六七桌酒席，为其弟、弟媳举行结婚筵席。郁达夫、郑伯奇等一众人，以及内山书店中几方店员等均在座。关于当时的情景，内山完造若干年后回忆道：“到大家快要拿起筷子的时候，我才宣布是我弟弟的婚礼，客人们都啊呀一声惊叫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半斋”似乎也成为内山完造介绍日本友人与鲁迅结识和交往的一个平台。《鲁迅日记》1933年9月2日记载：“晚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同席为福冈、松本及森本夫妇等，共十人。”福冈即福冈诚一，他早在1923年就已经与鲁迅相识，还曾一度与鲁迅交好的俄国盲诗人爱罗珂珂住在鲁迅位于北京八道湾的家里。1929年以后，福冈在日本联合通讯社任职，驻上海工作，所以这次是老友相逢。森本即森本清八，是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在上海分公司主任。《鲁迅日记》1934年2月5日记载：“午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同席志贺乃家淡海、惠川重、山岸盛秀，共五人。”

鲁迅在上海待了十年，并在上海走完了他短促的一生，他在上海的宴饮行迹，当然不止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比如国际饭店旁边的“功德林”素食馆、广西北路上的“聚园豫菜馆”等地方，也都留有鲁迅与友人宴饮的行迹。

## 醉翁之意不在饮

有宴有饮，这里的饮，多是指喝咖啡。1929年冬，“左联”开始筹备成立事宜。《鲁迅日记》1930年2月16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喝咖啡。”这天鲁迅就是到位于北四川路宴乐安路（今多伦路）转角处的“公啡咖啡店”，去参加“左联”的一次筹备会。当年曾担任“左联”常务理事的郑伯奇，后来回忆道：“公啡咖啡店是外国人开的，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太注意，开会比较安全。”“左联”成员、戏剧家赵铭彝也回忆说：“一九二九年秋夏行同志代表大会也在这里开的，二楼卖咖啡等饮料，上午几乎没有人去，很安静。”

因为离自己寓所和常去的内山书店很近，所以鲁迅经常假座“公啡咖啡店”会见友人。现代女作家葛琴在《（总退却）后记》中，就写她与鲁迅在“公啡咖啡店”的一次见面，听鲁迅谈文学上的各种问题。文章最后写道：“当我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青年的老人。”

除了“公啡咖啡店”，鲁迅寓所附近还有一家“白俄咖啡店”，这里曾留有鲁迅与成仿吾一次不寻常的会见的行迹。那是1933年11月，当时留在鄂豫皖苏区工作的成仿吾，一度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成仿吾在上海寻找无着，想到鲁迅，因此通过内山书店约见到鲁迅。当时瞿秋白、冯雪峰正在上海，还未去江西中央苏区，因此鲁迅很快帮助成仿吾接上党的关系。多年后，成仿吾回忆道：“我按时到了咖啡店，鲁迅先生已经在那里喝咖啡了，见到了我很高兴。我问鲁迅先生，你能否给我找个共产党的朋友？他说，你来得真好，过几天就没有了。于是我就把我住的地址，以及接头的暗号都告诉了鲁迅。鲁迅咖啡也不喝就走了，我也走了。找到鲁迅已经是我到上海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第二天就有人找我了。”可以想象，这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公啡咖啡店”的咖啡，更让成仿吾终生难忘的了。

《鲁迅日记》1934年2月12日记载：“下午同亚丹往ABC茶店吃茶。”次日日记又记：“下午同亚丹、方璧、古斐往ABC茶店吃茶。”“ABC茶店”坐落在现四川北路山阴路附近，离鲁迅寓所也不远。只要知道鲁迅连续两天在这里都和谁一起饮茶，就可知道这绝非一般的饮茶。这里的亚丹是曹靖华，方璧是茅盾，古斐是胡风。1934年初，从苏联回国后在北京任教的翻译家曹靖华来到上海，鲁迅将会晤地点约在“ABC茶店”。见面后，茅盾和胡风向曹靖华介绍了“左联”的工作情况，曹靖华也向上海的同志介绍了设在莫斯科的世界革命作家联盟的情况。可见在“ABC茶店”饮的是茶，交流的却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足见鲁迅在上海留下的这些宴饮行迹，皆有深意焉！

陆其国



鲁迅全家福。

午，鲁迅前往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拜访蔡元培。之后与民权保障同盟会（简称民保会）总干事杨杏佛及北平分会执行委员李济之，在这里合影留念。随后应杨杏佛之邀，在新雅大酒店宴饮。

同年12月8日鲁迅日记又记：“应俞颂华、黄幼雄之邀，至新雅酒楼宴饮。彼时俞、黄二人任1932年7月在沪创刊的《申报月刊》编辑，黄幼雄还是鲁迅在景云里的邻居，他办刊岂能不‘逼’鲁迅供稿？事实上1933年下半年，正是鲁迅为《申报月刊》不断撰写的半年。由此可见，这年年末、俞、黄邀请鲁迅在‘新雅’宴饮，既为答谢鲁迅对《申报月刊》的支持，也为如何进一步办好刊物和撰稿事宜向鲁迅请教。”

#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饭局」

## 宴饮间见友谊

1935年8月3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姚克来。王钧初来并赠《读（呐喊）图》一幅。”正是因为这个名叫王钧初的文学青年，鲁迅与建造于1934年的坐落在北四川路天潼路转角处的八层楼新亚大酒店有了交集。鲁迅与王钧初曾通过信，1935年秋，王钧初来沪，在沪期间，曾作《（呐喊）的读者》（鲁迅改为《读（呐喊）图》）油画一幅，预祝鲁迅五十五寿辰。多年后，王钧初回忆道：“当油画画好后，特地配上画框，亲自送去鲁迅寓所。”这与鲁迅日记所记吻合。其时，鲁迅为培养文学青年，曾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联系，介绍王钧初去苏联留学。王钧初赴苏前，特地来向鲁迅辞行。鲁迅因此邀姚克、王钧初在新亚大酒店吃饭，为后者饯行。当时鲁迅还赠送王钧初一部《北平笺谱》，并托他将日本友人高良富寄赠的一函两本《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带去苏联，转送给苏联画家。王钧初到苏联后，也多次与鲁迅通信联系。

鲁迅还有一次与“新亚”的交集，是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在“新亚”午餐。那是1936年2月11日，鲁迅在闸北“新月亭”会见山本实彦，商谈中日文化交流事宜，令山本大有收获。为表谢意，他在“新亚”宴请鲁迅。“新亚”因此也见证了鲁迅为传播进步文化而留下的行迹。

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人尽皆知，他们之间当然少不了会有宴饮之约，如内山就曾多次邀请鲁迅在坐落于汉口路湖北路处的“新半斋菜馆”（后改名“老半斋酒楼”）宴饮。“内山君邀往新半斋饭店”“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的记载，在《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其中1931年8月22日日记载云：“晚内山完造君来了。同年10月23日鲁迅日记记载：“在知味观设宴，请福民医院院长及吉田、高桥二君，会计古屋君夜饭，谢其治愈协和次子也，并邀高山、高桥及内山君，共八人。”原来这年夏天，友人张协和的次子生病，鲁迅为其垫款设法治疗。张子经医治病愈后，鲁迅又出钱在“知味观”办了一桌答谢宴，答谢从院长到医师，乃至会计，以及内山完造等八人。鲁迅对友人的真诚，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人尽皆知，他们之间当然少不了会有宴饮之约，如内山就曾多次邀请鲁迅在坐落于汉口路湖北路处的“新半斋菜馆”（后改名“老半斋酒楼”）宴饮。“内山君邀往新半斋饭店”“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的记载，在《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其中1931年8月22日日记载云：“晚内山完造君来了。同年10月23日鲁迅日记记载：“在知味观设宴，请福民医院院长及吉田、高桥二君，会计古屋君夜饭，谢其治愈协和次子也，并



完造（右）在内山「新月亭」。

鲁迅在上海的九年，不只有笔锋如刃，亦有宴饮往来。他常在陶乐春、中有天、新雅、公啡咖啡馆等处与友人相聚。一餐一饭、一杯咖啡，背后是文坛交游、文化交流、青年扶持与革命文艺的隐秘筹谋。那些看似寻常的宴饮行迹，蕴含着他的人情、风骨与担当。

## 到沪第一周，天天有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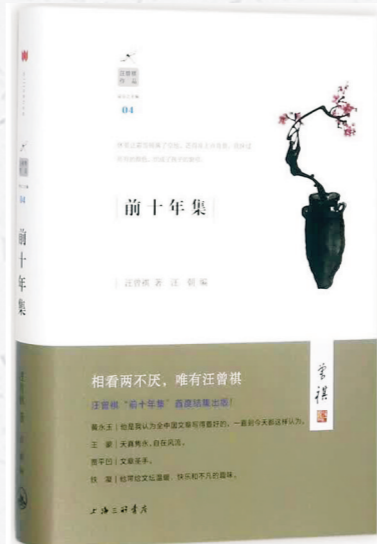
鲁迅是在1927年10月3日午后到达上海的。到上海的第一个星期，鲁迅天天都有饭局。《鲁迅日记》记载，抵沪当晚鲁迅即与许广平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等人及三弟周建人“往陶乐春夜餐”。四日、五日中午，又携许广平与孙伏园、许钦文等友人及周建人“往言茂源（吃）饭”。晚上“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出席者中增加了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等。六日“午达夫邀饭于六合馆，同席六人”。七日鲁迅作东，邀友人“饮于言茂源”，这次又多了林语堂。八日、九日两天，鲁迅携许广平和三弟周建人，与朋友在“中有天”吃饭。看与席的这些朋友，就可知鲁迅出入这些饭局，主要并不在吃，而是谈与文学和出版有关的事项，当然也会借此了解上海的情况。在这些饭局中，“中有天”或可费些笔墨一说。

20世纪20年代末，坐落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横浜桥南东宝兴路口的“中有天”，是一家川菜馆。鲁迅初到上海的几年间，因为这里距他居住的景云里寓所步行只需十分钟，所以无论邀约朋友还是自家便饭，到“中有天”用餐，很是方便。因为方便，这里一度也是鲁迅与友人宴饮和探讨文坛情况的一个场所。鲁迅在“中有天”除了宴请国内文化人士，还与国际友人进行文化交流。1928年岁末，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介绍时在上海的日本小说家前田河广一郎与鲁迅相识，鲁迅即在“中有天”宴请前田河广一郎，并邀郁达夫一起参加叙谈。1925年就与鲁迅相识的青年女作家陈学昭，于1927年赴法在巴黎期间，曾多次为鲁迅代购木刻插图书籍。1929年1月18日，陈学昭回国后拟再度赴法，鲁迅也是特地到“中有天”设宴，为陈学昭饯行。所以“中有天”也见证了鲁迅在上海文化活动的侧面。

除了到“中有天”，《鲁迅日记》中还有到“快活林”吃面的记载。1930年2月13日，鲁迅“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去“法教堂”是为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成立大会。关于“快活林”的具体地址，曾有不同的说法，现在多认为坐落在南京东路。“法教堂”即是位于九江路江西中路口的“圣三一教堂”，从“快活林”到“法教堂”不远，这在情理上应该说得过去。

还有一家坐落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50号的荷兰西菜室，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30年9月17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假座这家小型西餐馆，由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许广平等发起，经与在美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联系，在这里为鲁迅秘密举行五十寿辰庆祝会。参加者除了一些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外，还有叶绍弓、傅东华、茅盾等友人。另外还有进步教授、演员、新闻记者，以及学生和工人代表。那天下午，鲁迅身穿一件乳白色长衫，脚穿软底胶鞋，头发剪得很短，和许广平带着他们的儿子海婴很早就来到荷兰西菜室迎接大家。那天鲁迅很愉快，微笑着向陆续到来的客人表示谢意。大家也纷纷祝愿鲁迅健康长寿。史沫特莱还为鲁迅拍摄了两帧珍贵的照片。暮色降临后，部分客人先行告辞，留下二十多人晚餐。然后各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和友人向鲁迅致“祝贺词”。史沫特莱在祝词中评述了普罗文学的现状，并希望鲁迅坚决为发展普罗文学运动而努力。整个过程中，鲁迅一直微笑倾听着，最后致答词。他亲切地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的生活，以及后来弃医从文的经过。在讲到普罗文学运动时，他感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体会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这样是不能产生真正的普罗文学的。

比之荷兰西菜室，坐落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上的“新雅大酒店”，因烹调技术精湛闻名，所以名气要大许多。《鲁迅日记》1933年2月24日记载：“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这天上



汪曾祺女儿汪朝编选的《前十年集》。



汪曾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

# 汪曾祺创作生涯的一次“转身”

谈及汪曾祺，大多数读者的目光总会落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后的名作《受戒》与《大淖记事》上。前者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纯真情愫，如江南烟雨般温润；后者中，大淖儿女的鲜活坚韧，似市井烟火般炽热。这两篇巅峰之作，早已是汪曾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风格的代名词，被反复品谈、津津乐道。

在这些名篇的光芒遮蔽下，1947年，时年27岁的汪曾祺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绿猫》，却鲜少被提及。相较于《受戒》的澄澈、《大淖记事》的厚重，《绿猫》带着几分晦涩冷峻，然而它却如一块尘封璞玉，藏着汪曾祺创作生涯最关键的一次转身。重读这篇被忽略的作品，我们才能看清其美学风格的完整流变——那份恬淡诗意并非凭空降临，而是一场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绿猫》为枢轴的自觉蜕变，是作家从追摹西方现代主义到深耕本土生活的“内转”宣言。

## 以现代主义走上文坛

汪曾祺的文学之路，始于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激情。彼时校园里弥漫着西方现代派气息，年轻的他深受影响，将创作重心放在抽象哲思的追寻与新潮技巧的尝试上，满脑子都是“如何写得新奇”，却未察觉，脱离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字，终究漂浮冰冷。

1940年的《豹》，是汪曾祺初次集中尝试现代派技巧的作品。小说不完整情节，仅用意识流笔法，铺展少年春日午后的飘忽思绪，朦胧细碎。那些零散哲思更像是技巧试验的载体，人物情感单薄，读来总隔一层。两年后的《复仇》，将抽象思考推向极致，小说搁置“复仇”具体行动，全力描摹复仇者的内心纠葛，把一场本该有张力的行动，升华为与自我、存在对峙的哲学命题。奇崛比喻与跳跃意象虽显文字天赋，却让作品脱离生活土壤，晦涩空洞。

这种“重技巧、轻生活”的迷茫，在1941年的《待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在车站无尽等待，窗外是战乱荒芜，心中是莫名空虚，最动人的细节莫过于手中的书“字全没有了”，这恰似汪曾祺的自我剖白，流露着文字失效、创作迷失的茫然。他终于发现，西方借鉴来的内心苍白与象征手法，在真实的战乱焦虑面前苍白无力；脱离本土生活的现代派技巧，终究是空中楼阁，无法承载他对生活的思考与情感。《待车》如一声警醒，让他开始反思创作观念，将目光从抽象哲思拉回本土生活。

1945年的《小学校的钟声》，是汪曾祺“向内转”的首次尝试。他的笔触伸向故乡高邮的校园与童年记忆，那声“刻在我生命里”的钟声，不再是现代主义抽象意象，而是唤起乡土情感的感官纽带。“瓶花收拾起台布上细碎的影子”，这样的句子褪去晦涩，多了古典美学的恬淡，宣告其审美从“如何写”转向“写什么”。随后《老鲁》《异秉》《鸡鸣名家》相继问世，他用扎实的实践巩固这场美学调整。《老鲁》以生活细节勾勒鲜活市井人物，《异秉》展现市井人情百态，《鸡鸣名家》将普通劳动升华为审美体验，让生活自身的力量得以彰显。

但至此，汪曾祺早期现代主义的创作惯性仍未根除。他需要一场彻底的自我省察、一次决绝告别，才能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1947年的《绿猫》，便承担起这份使命。

## “绿猫”与“脏猫”

《绿猫》这篇看似晦涩的小说，是汪曾祺创作生涯的“精神界碑”，也是写给自己的“告别信”。

《绿猫》采用独特的元叙事结构，小说中有两个层次。“我”前去拜访作家友人栢，而栢正在书斋中深陷于创作一篇名叫《绿猫》的小说的焦虑。栢向“我”阐述他构思中的“绿猫”，它纯净、新奇、完美，是一个超现实的文学象征。然而，书桌下实际存在的，却是一只瘦骨伶仃、毛色脏污的普通小猫。栢执拗地想用颜料将这只小猫“染绿”，以贴合他脑中那个理想的意象，却屡屡失败，最终陷入瘫痪般的创作困境。

重读便知，“绿猫”从来不是真的猫，而是汪曾祺对自身早期创作的深刻隐喻。它象征着被绝对化的抽象文学观念，追求新奇、崇高晦涩，脱离生活本真，是“理想化”的写作模板；而那几只脏猫，代表着粗糙琐碎、充满缺陷却无比鲜活的日常生活。栢“染绿”小猫的行为，正是他对这一类创作理念的无情批判，当写作企图预设观念、新潮技巧来覆盖甚至取代鲜活的生活经验，便会走上自我否定的绝路。

最具匠心的是，汪曾祺用了最娴熟的现代主义技法，演绎并告别了这种技法本身：以抽象象征、跳跃意象，讲述了对批判抽象写作的故事；用晦涩叙事，完成对晦涩写作的反讽。栢便是汪曾祺早期的自我肖像，执着于观念完美，忽略生活本真；迷恋技巧新潮，忘却文字初心。栢的困境，是他曾经的迷茫；栢的挣扎，是他自我反思、突破的真实写照。

这场通过《绿猫》完成的自我清算，远超风格转换，是其创作本体论与创作学说的重建。通过“绿猫”与“脏猫”的对峙，汪曾祺明确了方向，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将生活“染成”想要的颜色，而在于接纳其本真；不在于追逐抽象哲思与新潮技巧，而在于扎根生活经验，发现日常诗意。这种觉醒，让他彻底告别迷茫，确立“以生活为本体”的理念，这便是《绿猫》最珍贵的价值，也未察觉，脱离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字，终究漂浮冰冷。这场“内转”，可被视为在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形式”讨论与现实主义深化的背景下，一位作家个体完成的、从内部发生的创作范式转换。它不仅是个人趣味的转向，更呼应了时代对文学扎根本土、关切现实的深层呼唤。

## 回归本真深耕生活

《绿猫》之后，自1949年起，汪曾祺进入长达三十年的沉潜期。这期间发表的小说作品很少，《羊舍一夕》《看水》《王全》《骑兵列传》等仅有的几篇作品，都是对《绿猫》理念的坚定实践；《羊舍一夕》将集体劳动化为少年成长诗篇；《看水》聚焦守望少年的细腻心境，展现人与自然的交融；《王全》深入边缘人物内心，体察人性温暖与复杂；《骑兵列传》打捞普通骑兵的日常痕迹，以个体生命碎片编织鲜活的集体历史记忆。

这三十年的沉潜，是他将创作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他如深耕土地的农夫，默默打磨笔触，修炼发现诗意的能力，将《绿猫》的美学信念，淬炼为创作本能。这份沉默积累，为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巅峰绽放，做好了充分准备。

1980年，《受戒》发表，惊艳文坛。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无哀哀烈烈的誓言，只有江南水乡的温润与烟火温情，“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告白，褪去矫揉，尽显生活本真，这正是《绿猫》中追求的境界，是告别抽象、扎根生活的必然成果。随后《大淖记事》发表，他以细腻笔触描绘大淖风物民情，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扎根这片土地，坚韧温暖，将《绿猫》确立的生活美学推向极致，标志着其“人间诗学”正式成型。

如今重读《绿猫》，才能真正读懂汪曾祺创作风格的来龙去脉。它虽无《受戒》的暖意、《大淖记事》的烟火气，却藏着作家最宝贵的勇气，敢于自我否定、主动转身，放弃空潮新潮的技巧，扎根本土生活与生命体验。

在这个信息爆炸、新观念迭出的时代，很多写作陷入对“新奇”与“深刻”的盲目追逐，恰似《绿猫》中的栢，执着于“染绿”生活，却忘记其本来颜色。而汪曾祺用《绿猫》告诉我们，文学的根本力量，不在于技巧华丽与观念高深，而在于真诚面对生活、体察人心，用温润文字捕捉日常美好与人性温暖。

汪曾祺的“内转”之路，始于迷茫，成于《绿猫》，终于巅峰。这篇被忽视的短篇小说，是理解其“人间诗学”的钥匙，也是“扎根生活”的创作范本。重读《绿猫》，不仅是重读一篇小说，更是重读一位作家的突破与坚守，重读一种回归本真、深耕生活的文学信念。这份始于《绿猫》的信念，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文艺创作，无疑仍是一剂清醒而温润的良方。

朱明荣